

纪念毛泽东

葛致巍 编著



中共保定地委党史研究室

目 录

· 领袖与保定地区 ·

毛泽东在胭脂河畔 (1)

毛泽东视察安国 (20)

亲切的关怀 难忘的时刻 (32)

· 研究与探索 ·

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 (38)

毛泽东写作文风概述 (50)

调查研究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59)

实事求是地看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影响 ... (65)

从共产国际的历史经验谈起 (77)

· 回忆录 ·

十七年前的九月九日 (90)

毛泽东看报 (92)

• 文学之窗 •

贡稼塘之歌 (94)

• 企业史篇 •

转变观念唱大戏 (169)

历史性的飞跃 (173)

（ 0 ） 雄县城关彩印厂在前进 (178)

• 领袖与保定地区 •

毛泽东在胭脂河畔

赵 宪

历史巨人毛泽东在 1948 年赴西柏坡之前，曾在阜平县胭脂河畔的城南庄和花山居住 46 天，在这里领导了老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部署和指挥了华北和中原战争；在起草“五·一”国际劳动口号中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伟大号召，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进驻阜平县城南庄

1948 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分区防御”的伟大胜利，为了照顾局势发展，中共中央决定由陕北迁驻河北，更有利地指挥和领导解放战争和其他各项工作。3 月 23 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胡乔木、章汉夫以及中央机关人员离开米脂县的杨家沟，从吴堡川口渡过黄河，在山西首临县双塔会合后，3 月 26 日，又前往晋绥军区驻地——兴县蔡家崖，然后取道苛岗、代县、五台，翻越华北“屋脊”五台山，在台怀镇稍作停留后，继续东进。

4 月 10 日，已是旧历春季时令，但五台山下依然寒风料峭，积冰随处可见。毛泽东一行在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

周荣鑫和保卫干部、警卫人员（由聂荣臻派往五台山接迎毛泽东主席等人）的陪同下，乘一辆中吉普从台怀镇出发，沿着山谷中的曲径首先向东南行进，但由于道路难走，汽车出了故障，途中又骑马行进，到石嘴以后，又折向向东北行，及至射虎川便开始攀登长城岭。

长城岭是因其顶巅建有内长城而得名。山阴地势较平缓，山阳形势险要，高二十华里，危崖峭壁，深渊狭谷和奇岩怪石构成了这里的地理特征。山脚下的龙泉关是冀、晋两省之间的重要关隘与涞源的倒马关，易县的紫荆关并称内三关，清朝曾设四品衔总兵把守。古代一些文人骚客有感于长城岭和龙泉关之险要，曾一次又一次抒怀吟哦：“傍塞孤成险，盘纡霄汉间，咽喉通西晋，节制重三关。”“虎护千年树，人披六月裘，夜来风不止，严鼓出谁楼。”

毛泽东一行，登上位于山巅的长城隘口，极目远眺，山岭连绵。其群体意象如浩瀚的万顷波涛，一层接一层，滚向天际，但各体意象又若一流流座碑记录着当地群众的丰功伟绩。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对敌斗争的前哨。长城岭以西是日军独立第三混成旅团的驻地，而以东则是我晋察冀边区的巩固根据地。日军曾多次越过长城岭犯我根据地，遭到当地民兵和正规部队的联合痛击。民兵们还利用长城岭的险要地势，摆下地雷阵，阻止日军来犯。1941年，日军推行“蚕食”政策，在长城岭头建立碉堡，各村民兵们在区委的领导下进行联防，截敌轻重，断敌水源，并将地雷埋在碉堡周围，最后迫使敌人将碉堡拆除，保证了我边区机关的安全。

长城岭上寒气袭人，那些密丛丛的林莽有的才绽新绿，有的依旧睡意朦胧。长城隘口，疾风犹厉。毛泽东主席等人

没有驻马，扬鞭穿过古老的长城，由山西进入河北。下山的道路尤为艰险，三步一转，五步一回，路面跌宕倾斜。然而其间却有许多名胜，大都与清圣祖康熙大帝于1683年西巡佛教圣地五台山有关。距长城岭隘口不远处有一泓碧泉，传说是康熙的御马在焦渴难忍时用蹄子刨出来的。泉池旁边竖一石碑，上书“马刨泉”三个大字，为乾隆皇帝所题写。在长城岭半山腰，有一深邃峡谷，是过往行人必经之地。谷口有一小山庄，二三十户人家，桌面上摆着大碗开水，一群大人孩子守候在路边，看见队伍过来，便热情地迎上前捧水相让。翻越长城岭人们已累得口干舌燥，有的支持不住，便闪在路旁接过水喝上几口补充一下体内的水分。在小憩中有人问该村叫什么名字，村民回答叫“龙宿庵”。听到这吉祥的名字又好奇地询问其来历。村民们说，康熙大帝到五台山晋香，进入山谷后，突然狂风大作，沙风石滚，神骇鬼惊，人马眯目，天地间一派混沌，康熙一行拨马返出谷外，屈驾在小山庄住宿，第二天才登长城岭。为了维护真龙天子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就把山谷命名为“回龙港”，把山庄命名为“龙宿庵”。这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故事为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东进增添了行色，有人情不自禁地说：“将来我们也一定能进北京主宰天下！”。

从龙宿庵到龙泉关只有一个多小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村外下了马，步行入关。龙泉关早已摆好了欢迎场面。这一带人们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感情无比深厚。在旧社会，他们大多租种五台山寺庙的土地，和尚、喇嘛对他们极为刻薄，租佃重、利息高。除正租以外，还有附加租，如菽豆租、瓜果租、柴草租等等。一年的收获几乎

一半以上交了租。土地改革以后，废除了所有债务和一切剥削，土地归为民有，他们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头天晚上，区、村干部告诉村民们，说有重要机关和大首长经过这里。他们虽然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但只要要是共产党，谁都想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第二天，曙光初露，全镇就沸腾起来，大人孩子都起了床，不少人特意换上了干净衣服。家家户户忙着抱柴烧水，龙泉关共有三条街，几临街的住户门口都摆上了开水，全镇人倾巢而出，排列在各个街道的两旁，恭候贵宾到来。有的人连早饭也没顾上吃，就来到街面上，一直站立了好几个小时，尽管饥肠辘辘，肚腹中咕咕直叫，但谁也不想回家填补一下空荡荡的肠胃，唯恐误了那股切盼望的一刻。

那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到了，毛泽东等人一进街口，欢迎的人群热烈鼓掌。毛泽东随意在街旁的石头上坐下，笑吟吟接过一位老太太递上来的开水，边喝边和身边几位老人谈话。首先询问生产和生活情况。人们告诉他，自从实行土地改革后，人们的生产劲头更大了，就连往日一些懒惰的人也积极生产了。龙泉关属于高寒地区，只种一季田，早玉米已经开始播种了。人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自从八路军来后，实行减租减息，生活开始好转。去年又免除了租佃，打下的粮食都归了自个儿，生活就更好了。这全托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福。毛泽东听后满意地连声说：“很好，很好。”接着又问龙泉关到阜平城有多远，到城南庄有多少路。

毛泽东等人在龙泉关休息片刻之后与周围的人握手话别，又继续赶路。人们目送毛泽东等人出村后，忽然有一个人大声说：“那个高个儿的不是毛主席吗？”

“噢——”人们沉吟了一会儿，“是，就是，那脸盘儿和他的像一模一样。”

“早知是他老人家，怎么也得把他请到家中坐一会儿，看看咱翻身的生活。”

一句话给众人波涛激荡的心灵上留下了无限缺憾，当他们再次翘首眺望时，毛泽东等人已经走远了，而那些给毛主席谈话的人则感到无比荣幸，又情不自禁地举起那只与伟大领袖紧握过的手。

毛泽东和党中央一路之上，都受到热烈欢迎，村村如此，无一例外。及至西下关时，已暮色沉落，但欢迎的人群尽管等候了一天，但仍未散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看到热情的群众十分感动，挥手致谢。他们在区、村干部的带领下，穿过人流夹道，进入闫国祥的院内。其中五间北瓦房毛泽东居住，东、南两面的房子分别由周恩来、任弼时居住。

11日午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从西下关出发前往城南庄，七十多华里的路程，需要多半天的时间，黄昏以后才到达。聂荣臻、刘澜涛等晋察冀党政军领导人在城南庄村外四、五里处迎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住在军区司令部院内，聂荣臻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毛泽东居住。

毛泽东对阜平人民的政治觉悟给了极高的评价，他刚到军区司令部院内，便兴致勃勃地对聂荣臻等人说：“到了晋察冀，就象当年在江西到兴国一样，群众见了我们都是笑逐颜开。”周恩来也高兴地说：“一到龙泉关，我们就有这样的感觉了，一路上经过的村庄，群众都是这样热情”。

4月18日，中央机关前往西柏坡，周恩来、任弼时也

到那里去了，毛泽东因身体不好，暂时留在城南庄。

两次土改座谈会

为了全面制定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明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纲领和政策。会议还研究讨论了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左”的偏向和几项具体政策问题。

当时，在土改中“左”的偏向主要表现是：侵犯中农利益，侵犯中小工商业者利益，破坏工商业，侵犯民族资产阶级，对待地主、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没有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对待恶霸和非恶霸没有区别，发生乱打乱杀的现象；在整党中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农村旧干部没有区别地一律“搬石头”……

十二月会议以后，各解放区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纠正工作中“左”的倾向。1948年4月，毛泽东将原来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又完整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主席为了进一步了解老区的土改，整党工作和贯彻执行十二月会议精神后的情况以及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干部觉悟和群众的生产、生活状

况，以便更好地指导新、老解放区的土地运动，在阜平召开了两次土改座谈会。

4月11日下午，毛泽东委托任弼时在西下关召开当地区、村干部座谈会，周恩来也参加座谈。被邀请的区干部有陆诤（区委书记）、陈大德（区长）、顾建业（区委副书记）、卢占鳌（区委组织）、韩贵生（区委宣传）、王苍生、武靖三和村干部贾洛殿。陆诤汇报了全区的土改工作，陈大德汇报了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生活情况。西下关朱家营村有名边区劳动模范，由于勤劳致富，上升为新中农，在土改中不仅被搬了石头，而且挨了斗。在该村领导土改的工作组以“送交法庭处理”的办法，将其保护起来。周恩来听后指示说：“英雄模范不能搬，有错误缺点可以引导。”周恩来、任弼时对在整党中搬了石头的干部也做了重要指示，本质好的干部要保护，他们的错误可以通过学习，提高觉悟，加以改正，不能一律打倒……

毛泽东到达城南庄的当天晚上，不顾长途中跋涉的疲劳，还要了解晋察冀边区的土改情况。聂荣臻考虑到毛泽东身体不好，请他早点休息，改天再汇报。第二天，毛泽东又安排和准备召开阜平、曲阳、定州三县县委书记和部分区委书记会议，了解三县的土改和整党工作。这个会议于四月下旬由任弼时主持召开。各县参加会议的人如期到达城南庄，其中阜平县委书记吴德峰、副书记李国庆、区委书记顾兰芳、谷惠参加了会议。在阜平二区细沟搞土改试点的邓颖超也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周恩来第一天和大家见面时一一询问了每个与会者的姓名。会议期间，每个县都汇报了各自的土改整党情况和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了“左”

的偏差和纠正情况，还把他起草的《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草稿发给与会者们征求意见。后经过修改，于5月25日作为中共中央对党内的指示下达。毛泽东还同与会人员一起就餐，并鼓励大家一定要注意党的政策，做好工作，领导好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聂荣臻还向毛泽东汇报了晋察冀土改情况和土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聂荣臻说，在土改问题上有人批评我是右倾原因是我没搞“左”的那一套。有的地方出现了消灭地主、富农现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的上改政策……过去在王明路线时期，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侵犯中农利益，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们先平分土地，再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就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来解决，消灭地主阶级是消灭它的剥削，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毛泽东说，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在根据地周围造成了严重的红白对立，我们每向外走一步都有困难，这是自己孤立自己……毛泽东还说，有人主张挖浮财，我说不能强调挖浮财。因为经营工商业的有地主，有富农、甚至还有中农。对此，在工商业上你很难分得清楚。我们党的政策是在土改中不损害工商业，这是从革命的利益出发的……②

毛泽东在阜平期间，还对新解放区的农村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在迅猛发展的战略进攻中，人民解放军收复和解放了大片地区。当时，有些新区农村在社会治安环境还不稳定的情况下，急忙搬用老区农村土改的作法，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斗争，效果很不好。只有少数勇敢分子得到利益，农民基本群众很少得到，甚至反而加重经济负担。社会财富受到

损失，对军队也不利。并在政治上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孤立敌人。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早在2月3日，毛泽东就致电刘少奇，提出把党领导的解放区分三种地区：老区（日本投降前的解放区）、半老区（日本投降至战略进攻前解放的地区）和新区（战略进攻后新开辟的地区），明确指出在新区要实行不同于老区的政策。5月25日，又把经过修改的《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做为中央文件发出，进一步完善了党在新区的农村政策。文件指出，对新区农村，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不应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而在充分利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可以先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使农村得到实益，使地主、富农多出负担，这样社会财富不致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有利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待条件具备时，再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

接着，又规定了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当地一切敌人的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改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根据上述条件，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在6月至8月的三个月内完成划完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从1948年的9月至1949年的3月，用七个月的时间完成乡村情况调查，按照政策实行初步整党。土改工作因必须首先团结支部组织内的一切积极分子和较好分子，共同领导当地的土改工作，组织或改组或充实贫农团和农会，发

动土地革命斗争。按照政策分配封建土地和封建财产，其结果必须使主要阶层都感到公道、合理，地主阶级分子生活有出路、有保障。建立乡、区、县三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三级人民政府。发给土地证，确定地权……完成党的支部组织的整理工作。最后将工作方向由土地改革方面转移到团结农村中一切劳动人民并组织地主富农的劳动力为共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奋斗的方面去……另外，为使土改中准确地划分阶级成分，5月25日，还做出了关于重新印发1933年两个土改文件的决定。“决定”指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在现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适用。因此，作为正式文件重发给各级党委应用。这些文件的发布和贯彻使以后逐步实行的土地改革，不仅纠正了或基本上避免了以往土改中的“左”的偏向而且为全国解放后的更大规模的土改积累了经验。

部署华北和中原的解放战争

在1947年的12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③。它全面体现了我军作战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战法、作战形式、战斗作风、战斗保障等一系列指导原则，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个解放区节节胜利。在中原战场上，从1948年3月至7月，歼敌16万余人，打破了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建立起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在西北战场上，1948年4月22日收复延安后，到5月份又收复了陕甘宁边区的大部分土地，并解放了黄河两岸大片土地。在华北战场上，到1948年7月，除

济南、青岛、临沂等少数据点外，全部解放，并收复了苏北广大地区，重建了江淮解放区，与中原解放区连接起来。在东北战场上，到1948年3月，敌人占领区缩小到东北面积的百分之一，长春、沈阳、锦州等城市陷于孤立。在华北战场上，到1948年7月除天津、北平、保定、塘沽一带敌占区和太原孤城外，大部分地区被我收复。这种迅猛发展的形势，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党中央和毛泽东来到阜平时，对如何取得全国战争的胜利已经有了全盘计划。一次，他对聂荣臻说，抗日战争打日本，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放得越早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接着，毛泽东谈了加速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的设想，首先把战略突破口选择在东北。第一步先解放东北、华北，为引开国民党的力量，让刘邓大军出太行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西北野战军到西北、西南去……④为了逐步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毛泽东在城南庄和晋察冀军区、华北野战军负责人研究当时的军理形势和作战部署。毛泽东到城南庄不久，就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肖克、参谋长赵尔睦等人研究制定华北的作战方针。为确保全部消灭东北境内的敌人，解放全东北，把华北野战军置于战略配合的地位：全力箝制关外的敌军，不使之入关，同时也不让华北的敌人出关增援东北，造成“关起门来打狗”的形势。

4月底，华北野战军负责人陈毅、粟裕奉命由西柏坡来到城南庄，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军事汇报会，参加汇报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毅、聂荣臻、粟裕和中央书记处的书记等领导人。听取汇报后，精辟地分析了

全国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部署了中原和全国的解放战争。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原作战，5月9日决定加强1947年5月成立的中原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并成立中原军区，刘邓大军和陈（庚）谢（富治）部队改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后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稍后粟裕为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还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刘少奇为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任主席。成立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任副司令员，赵尔陆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这些机构的成立，不仅对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建设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中央还试把华北做为一个国家的蓝图来试点。

在此之前的四月中旬，粟裕经过周密考虑，认为三个纵队渡江不一定能吸引国民党回防江南，反而分散了自身的兵力，再加上其他不利条件，不如继续留在中原作战为好。他就此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暂缓渡江的建议。经过仔细研究讨论，中央批准了粟裕的建议。

城南庄军事会议之后，华北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互相配合，从6月中旬至7月初，在中原战场共歼敌九万四千余人，并于6月17日至22日，攻克国民党河南省会开封，为不久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在城南庄期间，还签发了准备解放济南的命令，电告西柏坡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转告山东各方

面，几个月后，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

起草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

在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垂死挣扎更加疯狂迫害革命人民和残酷地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7月，蒋介石的“国府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所谓《国家总动员案》，接着下达了一个“戡乱动员会”。8月2日又公布了《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蒋介石还亲自召开各地特务头子会议，部署对爱国人士的迫害。

但国统区的人民并没有屈服，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英勇的斗争，“反饥饿、反内战”，“争自由、争生存”的斗争运动，在上海、北平等各大城市被伏此起，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反动派为安全其后方公开镇压与暗杀活动并举。仅1947年10月份，上海、杭州、北平等二十八个城市，被杀害的就有二千一百余人，被列入黑名单准备逮捕的六万多人。

蒋介石的法西斯面目完全暴露出来，12月27日公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并下令解散。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遭到迫害，不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在此情况之下，各民主党派重新组合，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1948年1月，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革命的立场上实行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在《成立宣言》中宣布，

“脱离蒋介石劫持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它的行动纲领规定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这时民主同盟在沈钧儒等人的主持下召开了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主同盟领导机关，并发表“宣言”说：“在是非曲直之间”不能有“中立态度”，提出“必须粉碎一个独裁、反动、腐化的政权”，支持我党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

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完全陷入了军事上失败，政治上孤立的困境。

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大目光，审势度时，于4月底亲自起草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时还号召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和解放区人民群众“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毛泽东委托聂荣臻用电话将口号逐条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征求修改意见。4月30日由陕北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⑤，各民主党派广泛响应。从5月5日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救国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此后，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在香港就召集新政协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提出许多积极意见。自1948年8月起，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便陆续来到